

海会记得每一次温柔打捞

□ 黄鹤权

那是一片奇异的蓝，我在许多旅人的相册里见过它。现在的厦门湾，白鹭贴着水面飞过，白海豚偶尔跃出弧线，沙滩上孩子们赤脚奔跑，笑声被潮水卷走又卷回。风是清透的，腥味淡得几乎闻不见，只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。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蓝曾经是什么样子，更没有人知道，为了这片蓝，有人在暗夜里站了多久。

十年前的同一片海域，泡沫浮球像疱疹一样铺满海面，塑料瓶和枯树枝在水流中打着旋儿，垃圾发酵的味道在夏天能飘出几里地。海湾淤堵得像个病人，呼吸沉重，每一声浪都像是叹息。那时有人站在岸边，望着浑浊的浪，心里想的是：这海，还养得活谁呢？那些后来把海打捞干净的人，和那些主动从海上退出来的人，他们都沉默着，像大海一样。他们不说，只有潮汐记得。

一

蔡志明第一次看清这片海的伤，是在2019年夏天。

那年他二十九岁，刚到厦门海上环卫站工作。在这之前，他

卖过海鲜，他以为海上的活儿会轻松一些，风大，空气好。第一次出海的那个清晨，他站在码头边，愣了很久。他看见海面上漂着成片的泡沫、断木、塑料瓶，还有不知道从哪冲来的破渔网，像一条巨大的灰白色补丁，覆盖在原本该是蓝色的地方。海水是灰绿色的，浑浊得像洗过拖把的脏水。他转过头，问身边一位老队员：“这东西，什么时候能少下来？”老队员四十多岁，皮肤被海风吹成深褐色，眼角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沧桑。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没有戏谑，只有一种被时间磨平了的平淡和疲倦。“十年。”他说。

蔡志明心里一沉。十年？他不信。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不太信命，也不太信“就这样了”。他总觉得，事情是人做的，只要肯做，总能快一点。

日复一日，早上七点出海成了他的日常。闹钟响的时候，天还是黑的，窗外一片沉沉的蓝灰。他从床上坐起来，摸黑穿好衣服，不惊动任何人。海上保洁作业没有周末，没有节假日。夏天的时候，六点刚过，太阳就从海平面

升起来，甲板很快就被晒到滚烫，鞋底踩上去能感到那股灼热隔着鞋底往上蹿。他戴着一顶草帽，帽檐被汗水浸得发黄、发软。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甲板上，“嗞”一声就蒸发了。冬天又是另一番滋味。海风像刀子，刮在脸上生疼，手指冻得发僵，握不住工具。他戴了两层手套，里面是一层棉的，外面是一层橡胶的，但海水还是会渗进去，顺着袖口流到手腕上，冷得人一激灵。最难挨的不是天气，是那种“好像白费力气”的感觉。机械打捞斗常常被渔网的线头、断枝的枝丫卡住，他得趴在船边，上半身探出去，伸手去扯、去拽、去一根一根地解开。手背上全是新旧交叠的划痕，有些结了痂，有些还泛着红。海水一浸，伤口就刺痛，他咬牙不吭声。有一次他拽一根卡死的尼龙绳，绳子突然绷断，他的手掌刮过船边一块铁皮上的毛刺，掌心划开一道口子，血一下子就涌出来。他用另一只手捏住伤口，看着血滴到甲板上，被涌上来的海水冲走。他没说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胶布，缠了两圈，继续干活。

最让他感到无力的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那片海仿佛永远不会变好。有时候，一片刚打捞干净的海域，隔天台风一来，上游的洪水又卷来整片垃圾。他站在船头，看着新漂来的白色泡沫、塑料瓶、枯树枝，唯有沉默。那些东西在水面上浮浮沉沉，像在嘲笑他。他想起老队员说的“十年”，忽然明白了那句话里的意味。不是十年太长，而是这片海的伤，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。那段时间他不太说话。晚上回到宿舍，他躺在床上，眼睛睁着，天花板是黑的，脑子里全是海面上那些无穷无尽的白点。他问过自己：这到底有没有意义？他能打捞完今天，打捞完明天，但打捞不完台风带来的、潮水带来的、上游冲下来的。他像在漏水的船上往外舀水，水舀出去，又灌进来。后来他跟站里的一个老船员聊过这个感受。老船员没读过什么书，说的道理却扎扎实实：“海不是一天变脏的，也不可能一天变干净。你舀一勺，它就少一勺。”

转折发生在2020年夏天。那一次台风走了一条奇怪的路线，先在福建沿海徘徊了两天，然后才慢悠悠地拐向东北。风不大，但雨大，九龙江上游的洪水带着整片山林的枯木、杂草，以及沿岸的生活垃圾、建筑废料，浩浩荡荡地涌向厦门湾。风停的那天早上，蔡志明出海去看情况。远远地他就看见了，海面上覆盖着

一层厚厚的垃圾，像一床巨大的灰白色棉被，从天际线一直铺到脚底下。枯木横七竖八地浮着，泡沫碎片密密麻麻，塑料瓶在浪尖上翻滚。他说不出话，胃里翻涌了一下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对队友说：“干吧。”那一次，他们连续作业了四十多个小时。吃饭在船上扒两口，困了就在甲板上靠一会儿，打盹不超过二十分钟就醒。没有人抱怨。不是因为大家觉悟高，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如果不抓紧时间把这些东西捞起来，风浪一起，它们散到整片海湾，几个月都清不完。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所有人累到话都说不出来。蔡志明的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，手掌上的水泡破了又长，长了又破，最后变成一层硬硬的茧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布满血丝，嗓子因为一直在喊话已经沙哑得只剩气声。

收工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他瘫在后甲板上，仰面躺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夕阳西沉，最后的余晖铺在海面上，像熔化的金子。他侧过头，看着那片被他们连续清理过的水域，泡沫没了，塑料瓶没了，枯木也没了。海水恢复了它本该有的颜色，夕阳的光线落在水面上，折射出一片均匀的、没有杂质的、透亮的光。那光线不像实物，像一丝细细的、会发亮的丝线，从水面一下子扎进了他眼睛里，又从眼睛扎进了心里。他忽然觉得，值了。不是什么豪

言壮语，不是什么慷慨激昂。就是那一刻的光线，那一片干净的水面，和他酸痛的、不再年轻的身体，合在一起，组成了一种踏实感。从那以后，他的沉默变了味：不再是一种压抑的、带着怀疑的沉默，而是一种踏实的、笃定的沉默。他知道这片海不会一夜变好，但他也知道，每一个他出海的早晨，都离那个“好”更近了。

2023年台风“海葵”登陆的那个深夜，预警升到了最高级。凌晨三点，厦门西堤码头的灯在风雨中剧烈摇晃，像随时要被撕碎。街道上空无一人，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，铁皮卷帘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，人们缩在各自的房子里等待天亮，没有人知道海上正在发生什么。蔡志明站在码头上，雨衣被风灌成了鼓胀的帆，雨水顺着领口往下淌，后背早就湿透了，冰凉的水贴着皮肤往下流。他盯着海面，瞳孔收得很紧。九龙江上游的洪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，不知浑水是否会像以前那样裹挟着枯木、塑料、泡沫、生活垃圾，浩浩荡荡地涌向海湾。两百三十平方公里的海域，如果失守，几个月的清理就会前功尽弃，又得从头来过。

他整夜都在巡逻。加固缆绳，检查船位，盯着气象图的每一次更新。手机屏幕的蓝光映着他的脸，他眉头始终没有松开过。他就那样站在风雨里，像一棵老树，沉默地扛着。扛到天亮，扛到风

小下来，扛到海面终于没有变成一片狼藉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风终于收了势头，雨也渐渐小了。他站在码头边，看着海面上零星漂着几根枯枝，不多，不成片，没有形成大面积污染。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那股气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变成一团白雾，散了。后来老队员问他，那晚怕不怕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怕。但怕有什么用？”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十年前我肯定站不住。但那天晚上，我站住了。”他说完这句话，自己也有点意外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站住的？说不清楚。也许是那些出海的凌晨，也许是那个夕阳如血的傍晚，也许是每一次机械斗被卡住、手掌被划破但第二天依然出海的时刻。十年，他把自己像一根桩子一样，钉进了这片海里。

二

沈东勇在东山岛养了二十年鲍鱼。他的双手被海水泡得发白，指甲缝里嵌着细盐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用力搓的时候能搓出白色粉末来。他今年五十出头，但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一些。眼角往下耷拉，嘴角也有点往下撇，常年沉默让他的脸定格成了一副“没什么表情”的模样。他不爱说话，但不代表没有问题堵在心里。

早年的海湾不是现在这样的。那会儿，海湾像一片无边无际的

棋盘，密密麻麻全是网箱，白色的泡沫浮球铺满海面，从岸上看过去，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见水。网箱下面，是成千上万只鲍鱼在缓慢地生长，它们吸附在瓦片上，壳上长着绿色的海藻，一年一年，从指甲盖大小长到巴掌大。那会儿的渔民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：海这么大，取不尽。沈东勇也是这么想的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走到码头，雨鞋踩在石板上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。喂料、换水、查看病害，手掌被海水泡得发白，指尖总是皱巴巴的。他日复一日地出海、投料、收鲍鱼，手心里的茧越来越厚，腰也越来越弯。养鲍鱼这件事，看着简单，其实全是细碎的、磨人的活。鲍鱼娇贵得很，水质稍微变差一点就不长，温度高了就死。他得时时刻刻盯着，像伺候孩子一样小心翼翼。但再累，他也觉得踏实。鲍鱼出箱的时候，一筐一筐的，沉甸甸的，壳面上闪着珍珠般的光泽，那都是真金白银。他把钱一沓一沓地收好，存进银行，心里想的是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靠海吃海，天经地义。就连滩涂上弹涂鱼、招潮蟹渐渐消失的时候，他也没多想。海太大了，少几样东西算什么？他太忙了，忙着喂料，忙着收鲍鱼，忙着数钱，没空去想那些看不见的变化。

第一道裂缝出现，是在那场

台风之后。那年的台风走了一条特别刁钻的路线，预报说会在广东登陆，结果半路拐了个弯，直直撞向了东山。风来的时候，沈东勇还在岸上捆绳子，风一下子把网箱旁边的板房掀翻了，铁皮屋顶飞出去几十米远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扭曲声。他愣了两秒，然后疯了一样往渔排上跑。来不及了。渔排断成了两截，缆绳绷断的声音像鞭子抽在空气里，网箱被掀翻，鲍鱼散了一片。他站在码头上，看着海面上漂着价值数十万元的死鲍鱼，浑身发抖。台风过后，海面平静下来，他乘着一艘小船去看被毁掉的网箱。那片他养了十几年鲍鱼的海域，海水浑浊得像泥汤，能见度不到半米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风平浪静，水面上什么也没有，水底下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蹲在船头，盯着那片浑水，很久没有说话。一个念头冒了出来，像一根细细的刺，扎在某个他说不清楚的地方，不是台风在毁他，是这片海，已经变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了。

在那之后，他开始失眠。不是担心台风再来一次，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去想一个问题：养了这么多年鲍鱼，这片海到底还剩下一什么？他在渔排边上坐了很久，看着海面，第一次意识到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片海的底了。以前海水清的时候，站在船上往下看，能看见水里的礁石和海草，

能看见鱼的影子一闪而过。现在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海面是一层浑浊的绿，像蒙了块洗不干净的塑料布。他想起小时候，这片海湾里有一种青色的小虾，一到了特定的季节就成群结队地游到岸边，孩子们拿网兜就能捞到半桶。那虾肉质鲜甜，拿开水一烫就红了。现在，那种虾已经很多年没人见过了。他又想起那些搬开浮球时水面腾起的恶臭，不是单纯的海腥味，而是一种更复杂的、沉积了太久的东西腐烂之后的气味。他以前不在意，觉得那是海该有的味道。现在他开始觉得不对了。

政府发出退养通知的时候，码头上到处是骂声。有人把文件拍在桌子上，吼得整条街都听得见：“凭什么我的网箱要拆？我养了二十年！这是我的命！”有人堵着工作人员的车，情绪激动得脸都涨红了。沈东勇夹在人群里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没有参与那些争吵，他只是站在人群边上，背靠着墙，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，面无表情。回到家里，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点了一根烟，看着远处那片白茫茫的海面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妻子进进出出，看见他坐在那里，想问又不敢问。他们结婚二十多年，妻子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，他不愿意说的时候，问也没用。他只是抽烟，抽了一包，又拆开一包。烟雾缭绕在他周围，像一层薄薄的屏障，把他和外界

隔开了。

他不知道除了养鲍鱼，他还能做什么。他这辈子，所有的技能、所有的经验、所有的社会关系，全在这片海上。他认识码头上的每一个人，知道每一种饲料的价格，清楚每一片海域的水流和温度。但这些东西，在退养之后，全都不值钱了。他站在一片空地上，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。

他想起更久以前的一件事。大概十几年前，他刚出海不久，还年轻，不像后来那么忙。有一天傍晚，他把船停在一个小湾里，半躺在舱面上休息，双手枕在脑后，腿跷在船舷上。那会儿海还是清的，他侧过头，能看见水里的石头和几条小鱼在慢悠悠地游。夕阳在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，海水轻轻地荡着，船也跟着轻轻晃，像摇篮。那个画面没什么特别的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，但他一直记得。很多年以后他还能想起那个傍晚的细节，风从远处吹过来，带着一股干净的海腥味，脚下是清澈的海水，头顶是渐暗的天色。他想，那个海，还有没有可能再回来？

他把烟掐了，烟头在阳台的水泥地上滚了滚，灭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向客厅。妻子正在厨房里择菜，背对着他。他说：“签了吧。”妻子的手停住了，没有回头。沉默了几秒，她问：“想好了？”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点试探。他说：

“想好了。”他没有解释为什么，他解释不清楚。他只是觉得，那个傍晚的海，那个能看见水底石头的海，那种有鱼在脚下慢悠悠游着的海，他愿意给它一个机会。就算它回不来，至少他试过了。就算所有人都骂他傻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也不会是这一次让步。

网箱拆掉的那天，他上了船，亲自帮忙拉网。一条一条的缆绳从水里提上来，沉重、湿漉漉的，上面挂着一层滑腻的藻类。浮球被一个个卸下，堆在岸边，白的、蓝的、橙的，像一堆彩色的贝壳。大半天工夫，一整片海湾空了。水面上第一次什么都没有了，空旷得像一片从未被人类触碰过的海域。他站在船头，看着那片被清空的水面，浑浊的、安静的、灰绿色的。他没有特别难过，也没有如释重负。他只是觉得，像把自己攥了二十年的东西，轻轻地放在了地上。手心空了，有些凉。

几个月后，海湾变了。不是一点点变，而是肉眼可见地变。以前那种浑浊的灰绿色，渐渐透出了青蓝的底色。站在岸边，能看见水深了一点的地方，那种以前消失不见的透明度，正一点一点地回来。他第一次发现，是那次台风过后。他去海边查看，以为又会看到死鱼、垃圾、浑水，没想到海面是一片干净的蓝。他

愣住了。然后他开始注意到更多变化：以前寸草不生的滩涂上，重新冒出了绿色的东西；以前空空荡荡的礁石区，有小鱼在石缝里钻进钻出；有几个早晨，他站在岸边，忽然看见水面下有什么东西一闪，定睛一看，是鱼，一条巴掌大的、银白色的鱼，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。然后他看见了招潮蟹，小小的，从泥洞里跑出来，举着一只大钳子，横着走。他看见了弹涂鱼，在泥滩上蹦跳，留下一串小小的坑。夏日的午后，远处浪花里有灰色的、光滑的脊背一闪而过，白海豚！他站在码头上，看着那个弧线消失在浪花里，眼眶有点热。那天晚上他喝了一点酒，坐在阳台上，月光照在海上，海面是一片均匀的银白色。他忽然意识到，那个傍晚的海，真的回来了。

他开了一间小民宿。房子不大，是以前老宅改造的，外墙刷了一层淡蓝色的涂料，靠海的那一面开了一扇大窗。二楼有一间看得见海的房间，窗户正对海湾。躺在床上，面朝大海，就能看见日出和日落。他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干这一行，他不善言辞，也不会招呼客人。但他发现，其实不需要他做什么。游客们自己来，自己看海，自己拍照，自己离开。他只需要在院子里摆几张椅子，烧一壶开水，茶叶就放在茶几上，谁想喝自己泡。来了个广东的摄

影爱好者，住在民宿里拍了一个星期，每天天不亮就扛着三脚架去海边等日出。他临走的时候跟沈东勇说：“你这里真好，海是真蓝。”沈东勇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又来了一个新疆的女孩，坐了四十个小时的火车。她站在阳台上对着大海喊了一声，回头跟沈东勇说，她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海。

以前的渔友偶尔会来找他喝酒。有人喝到半醉，说：“你倒是轻松，拆了网箱开个民宿，每天看看海就有钱赚。”沈东勇端着杯子，没接话。他知道，这不叫轻松。这叫把提了半辈子的东西放下。放下比攥着要难得多。但他也说不清楚那种正在变好的感觉。他只是觉得，海没有骗人。你让它一步，它还你一片蓝。

三

2024年秋天，一个很普通的下午。蔡志明驾驶的保洁船在九龙江附近一个锚地补给淡水。台风季刚过去不久，船上的淡水消耗得差不多了，他指挥着船靠岸，接上水管。趁着补给的间隙，他端着搪瓷杯，靠在船舷上，喝了一口水。夕阳正在西沉，落在他面前的海面上。他抬头的时候，看见岸上不远处有一栋淡蓝色的小楼，二楼窗口正对着海。门口放着一把藤椅，藤椅上坐着一个人，面朝海湾，一动不动，像在看海，又像在想什么。蔡志明看

了他几秒钟，视线没有停留太久。他又喝了一口水，目光重新回到海面上。他注意到这片海湾的水很干净，没有泡沫，没有塑料瓶，没有枯枝烂叶，海面上清清爽爽，风一吹，只起一层细细的银色皱纹。他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，像是赞许，又像是安心。片刻后水管接到了船上，他放下搪瓷杯，检查了一遍甲板上的缆绳。他没有上前打招呼，他压根没想过要认识那个人。他把搪瓷杯收好，走进驾驶舱，拉响了汽笛，一声短促的“呜”在海面上荡开，像一句不需要回应的问候。船缓缓驶离锚地，船尾的航迹在海面上画出一道渐渐散开的白线。

沈东勇在那个下午，只不过坐在藤椅上看着海。他听见远处传来的一声汽笛，抬眼望去，一艘白色的保洁船正从海湾的一端驶离，船身在海面上平稳地向前，船头划开海水，两侧翻起白色的浪花，像一把犁在缓缓地耕掘。他看着那艘船越走越远，渐渐变成了海平线上的一个白点，然后被暮色吞没了。他不知道船上有谁，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，甚至不知道那艘船从哪里来、要到哪里去。他只知道，那艘船在海上走了。天黑了，他站起来，把藤椅搬回屋里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海面，黑蓝色的海水上还留着最后一道暮光。

他们从未交谈，也不会知道

彼此的名字。两条线平行地穿过同一片海域，没有交汇。但蔡志明的每一铲垃圾，挡住的恰好是经洋流和潮汐传入东山湾的浊流。如果没有他日复一日地在厦门湾上游拦截，那些垃圾、漂浮物、枯木，迟早会顺着海流来到这片海湾，落进沈东勇每天看海的目光里。

而沈东勇让出的那一片海面、退出的那一片网箱、拆掉的那一片浮球，恰好清空了海湾的拥挤和淤堵，让海水重新开始呼吸。如果没有他的退让，这片海湾的水质不会恢复得这么快，蔡志明站在甲板上看到的可能依然是灰绿色的浑水。

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，做着自己的事，守着自己的海。

互不相识，但山鸣谷应。不是因为认识了，而是因为做对了。海浪会带着他们的沉默，从一个海湾，传到另一个海湾。你做过的事，海都记得。

现在，蔡志明偶尔会在驾船巡航时看见那家淡蓝色的民宿。有时他会在锚地多停几分钟，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，只是靠着船舷多喝半杯水。他看见门口那把藤椅上经常坐着一个人，看不清脸，只是一个人影。他也从没想要看清，那片海干净就行，那个人坐不坐在那里，都行。沈东勇偶尔也会在码头上看见那些白色的保洁船远远地驶过。他不知道船上有谁，可能有一人，也可能没有。他只是会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把身体靠向椅背，面

朝大海，视线追着那道白色的船影，一直看到它消失在天际线。船没了，他就收回目光，喝一口茶，继续看着那片什么也没有的蓝色海面。

十年有多长？足够一个人从“老子不信”到“我站住了”，也足够一个人从“海这么大，取不尽”到“我把海让出来”。有人用一把铲子与时间赛跑，有人用一次让步等回声更久。站在船上的人或许不知道前路有多长，坐在门口的人也许不知道回声会不会响起。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然后，潮汐帮他们完成了剩下的部分。^①

（黄鹤权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福州市作协《海峡诗人》杂志编辑）

